



汪曾祺孤独温暖的旅程

□ 铁 凝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

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

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

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

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

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

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头了。

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

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

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

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本本回忆录。

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

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

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

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

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

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干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

用文学，或者用蘑菇。（摘自《名家散文精选》）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 鲍尔吉·原野

初夏羞怯地来到世间，像小孩子。小孩子见到生人会不好意思。尽管是在自己的家，它还是要羞怯，会脸红，尽管没有让它脸红的事情发生。小孩子在羞怯和脸红中欢迎客人，它的眼睛热切地望着你，用牙咬着衣衫或咬着自己的手指肚。你越看它，它越羞怯，直至跑掉。但过一会儿它还要转回来。

这就是初夏。初夏悄悄地来到世间，踮着脚尖小跑，但它跑不远，它要蓬蓬勃勃地跑回来。春天在前些时候开了那么多的花，相当于吹喇叭，招揽人来观看。人们想知道这么多鲜花带来了什么，有怎样的新鲜、丰润与壮硕。鲜花只带来了一样东西，它是春天的儿子，叫初夏。初夏初长成，但很快要生产更多的儿子与女儿，人们称之为夏天。夏天不止于草长莺飞，草占领了所有的土地，莺下了许多蛋。夏天是一个昏暗的绿世界，草木恨不能长出八只手来抢夺阳光。此时创造了许多阴凉，昆虫在树荫下昏昏欲睡。

然而初夏胆子有点小，它像小孩子一样睁着天真的眼睛望向四外。作为春天的后代，它为自己的朴素而羞怯。初夏没有花朵的鲜艳。春天开花是春天的事，春天总是有点言过其实。春天谢幕轮到初夏登场时，它手里只带很少的鲜花。但它手里有树叶和庄稼，树的果实和庄稼的种子是夏天的礼物，此谓生。生生不息是夏天之道。

初夏是第一次来到世间，换句话说，每一年的初夏都不是同一个夏天，往年的夏天早已变为秋天与冬天，它没有经验可以利用。夏天的少年时光叫初夏，它不知道怎样变成夏天。每当初夏看一眼身边的葱茏草木都会吓一跳，无边的草木都是奔着夏天来的，找它成长壮大。一想到这个，初夏的脑袋就大了，压力也不小。初夏常常蹲在河边躲一躲草木的目光，它想说它不想干了，但季候节气没有退路，不像坐火车可以去又可以回来。初夏只好豁出去，率领草木庄稼云朵河流昆虫一起闯天下，打一打夏天的江山。

初夏肌肤新鲜，像小孩胳膊腿儿上的肉，没一寸老皮。初夏带着新鲜的带白霜的高粱的秸秆，新鲜的融化才几个月的河流，新鲜的带锯齿的树叶走向盛夏。它喜欢虫鸣，蝈蝈儿试声胆怯，小鸟儿试声胆怯，青蛙还没开始鼓腹大叫。初夏喜欢看到和它一样年轻幼稚的生命体，它们一同扭捏地、热烈地、好奇地走向盛大的夏天。

人早已经历过夏天，但初夏第一次度夏。它不知道什么是夏天，就像姑娘不知道什么叫妇人。这不是无知，是财富。就像白纸在白里藏的财富，清水在清里藏的财富，这是空与无的财富。人带着一肚子见识去了哪里？去见谁？这事不说人人都知道，人带着见识与皱纹以及僵硬的关节去见死神，不如无知好。如果一个人已经老了，仍然很无知，同时抱好奇心与幼稚的举止，这个人该有多么幸福。只可惜人知道的太多，所知大多无用，不能帮他们好好生活。

初夏走进湿漉漉的雨林，有人问它天空为什么下雨，初夏又扭捏一下，它也是第一次见到雨。这些清凉的雨滴从天空降落，它是从喷壶还是筛子里降落到地面的？天上是不是也有一条河？初夏由于回答不出这些问题而脸红了，比苹果早红两个月。

初夏跑过山冈，撞碎了灌木的露水。它在草地上留下硕大的脚印，草叶被踩得歪斜。初夏的云像初夏一样幼稚，有事没事上天空飘几圈儿。其实，云飘一圈儿就可以了，但初夏的云鼓着白白的腮帮子在天空转个没完，还是年轻啊。你看冬天那些老云窝在山坳里不动弹，动也是为了晒一晒太阳。初夏的云朵比河水汹涌。大地上的草花要等到夏天才绽放。开在枝上的春花像高明人凭空绣上去的，尤其梅花，没有叶子的帮衬。而草花像雨水一样洒满大地，它们在绿草的胸襟上别上一朵又一朵花，就像小姑娘喜欢把花朵插在母亲的发簪上。

初夏坐在河流上，坐在长出嫩叶的树桩上。初夏目测大地与星空之间的距离。它寻找春天剩下的花瓣，把它们埋在土里或丢在河里漂走。初夏藏在花朵的叶子下面，等待蜜蜂来临。初夏把行囊塞了一遍又一遍，还有挺多草木塞不进去。要装下这么多东西，除非是一列火车。

（摘自2015年07月24日《光明日报》）



（图片来自网络）

秦腔是一种生命呐喊

□ 陈 彦

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哪门艺术能如此酣畅淋漓地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激情，如此热血奔涌地呼喊一个人的生命渴望，如此深入腠理地宣泄一个人的生命悲苦，想想唯有秦腔。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待见不待见，珍视不珍视，它都以固有的方式存在着，不因振兴的口号喊得山响而振兴，不因“黄昏”的论调弹得地动而“黄昏”，也不因时尚的猛料生余烹燹而时尚。总之，秦腔是我行我素，处变不惊，全然一副“铜豌豆”做派，它就是一种呐喊的模样。

秦腔到底生成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大家都接受的论断，有人在《诗经》里就找到了“秦腔”二字，当然那个秦腔明显不是今天所说的这个“以歌舞演故事”的秦腔；有人说秦腔原创于秦代，这话初听似有道理，可时至今日也无太多史料可供佐证；有人说秦腔糅成于西汉百戏涌流长安时期，但研究资料缺乏相互支持，尤其是无成形唱本传世，似乎也不足为取。倒是秦腔成于盛唐之说，不仅有正史野史考据，而且有唐人评李龟年唱《秦王破阵曲》“调入正宫，音协黄钟，宽音大噪，直起直落”的说辞，这种演唱特点和方法，也正是秦腔至今都在传承效法的正宗腔调，因此可以说李龟年的“秦王腔”，当是有史可考的早期秦腔。

秦腔至明朝已是比较成熟的形态，不仅盛行于陕西、甘肃一带，而且随着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四处征战而流播八方。据载，起义领袖们个个都是秦腔爱好者，有的甚至是高级“票友”。而李自成出身乐户，唱秦腔更是够得上专业水平，因此连军乐都采用的是秦腔曲调。有如此多的说了话就能算数的领袖人物关心爱护，加之大规模的战争席卷，自然使秦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进与发展。到了清朝中叶，秦腔更是登上了中国戏曲的霸主地位，在有名的“花雅之争”中，甚至“打败了”（引用典籍语）昆曲、京腔，成为一个时代的戏曲最强音。所谓“花雅之争”，就是民间与正统之较量，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自是“花部”，而以昆曲为代表的上流戏曲则是“雅部”，“花”即旁出、非主流、野路子、下里巴人之意；而“雅”则是正出、高雅、中规中矩、温文尔雅之资质。今天看来，“花雅之争”其实是民间力量对少数士大夫阶层所固守的“小众文化”的一种潮汐与遮蔽，胜败之说似乎有点过于意气用事。所谓秦腔“打败”昆曲之时，正是洪昇写出《长生殿》和孔尚任诞生《桃花扇》的传奇创作巅峰时期，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至高的境地，随之形成了文人雅士更进一步的雕琢之风，终使昆曲成为花瓶，而被广大受众所抛弃。以秦腔为代表的“花部”戏曲，则带着与生俱来的生命率性与忠孝节义的恒定思维，使观众重新找到了心理适应，它的“杂乐共作秦声尊”的一时显赫当是事物律动的必然。不过这种“香饽饽”时期很快就被代表着士大夫阶层的清政府搞臭，他们视异常率性本真的秦腔为粗俗、不洁。先是不许在京城内登台亮相，班社只好到京郊“窜动”，后来干脆完全赶出京师，并明令严禁演出与流播，秦腔艺人被卖身为奴，其子孙三代不得应试入仕。时有陕西华县一秦腔“大腕”因中举而头颅被“喀嚓”，诸多“粉丝”为其鸣不平悉数遭“严（厉）打（击）”。秦腔由此进入了低迷时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秦腔并没有因为清朝政府的“喀嚓”而喀嚓断裂，历史反复证明，只要是深扎于寻常百姓心头的那点“乐子”，那点爱好，那些故事，即使割掉了一茬茬脑袋，还会有更多的脑袋长出来。现在不仅“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就连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都弥漫着豪气冲天的大秦之音。相反，倒是清政府极力推崇的昆曲至今仍需特别加以保护才能维系一脉香火，个中情由实在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明的。试想当初秦腔要是被乾隆爷爱上，千恩万宠弄进官去，先把那些“毛糙”的东西打磨掉，再精雕细刻一番，镶上几颗金牙，敷上一层脂粉，让男人像鼻子被鬼捏住了一样作女人腔，最终把秦腔搞成牙雕、鼻烟壶之类仅供少数人把玩的“珍品”也未可知。看来民间的东西走向象牙塔真不是什么好事，秦腔能有今天的红火热闹，清政府绝对是对着了大忙

的，要不是他们飞起脚来把从京城踢出去，让这种腔调远离贵族气、精巧气、鸟笼子气，还真不会有今天的生命景观与博大气象呢。

秦腔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具有生命的活性与率性，高亢激越处，从不注重外在的矫饰，只完整地呈现着生命呐喊的状态。我曾经对一位想了解秦腔的外国记者讲：秦腔酷似摇滚乐，喊起来完全是忘我的样态。那位记者在看演出时，见“黑头”出来一唱就乐呵了，直说大像摇滚，只是节奏有些缓慢而已。很快，“黑头”又唱起了“滚白”，节奏之疾劲犹如铁锅崩豆，毫不逊色于现代人的情感宣泄，他终于对我的“摇滚说”完全信服了。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各种都市摇滚，从某种程度上讲，有点接近秦腔对生命的“魔性”阐释，但远远只是皮毛。那种呐喊带着太多个人欲望与情绪化表达，而缺乏生命的深度，喊一喊就过去了，可秦腔对命运、人性的深层呐喊仍在不惊不乍地继续。我们有时会想当然地把老戏归结为宣扬封建传统那一套，固然有，但不可以偏概全。有的实在是不了解“戏”之“老”，老戏对弱者的同情抚慰，对官场弄权、黑恶势力的指斥批判，以及对善良的奔走呼号和对邪恶的鞭笞棒喝，从来就不曾下过软蛋，且民间之立场更是货真价实，而非伪饰矫情。

秦腔是不容置疑的民族最古老戏曲剧种，号称“梆子声腔鼻祖”。所谓梆子声腔，就是以枣木梆子打击节奏的一种板腔体剧种。在近千年的沧桑世事流变中，多少嫩花香草婆婆婆舞动一番便烟消云散，而“鼻祖”却始终没有因年事已高而声息微弱，相反倒是随着时间推移愈来愈精神矍铄、老当益壮。据不完全统计，仅西北五省区就有各类秦腔剧团数千家，多年前我曾了解到，甘肃甘谷县人口五十六万，业余秦腔剧团六十五摊，而遍布在大西北城市中的秦腔茶园，更是擂台叠加，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无利照来也攘往。至于在都市杳见、校园一隅、乡村背街、田间地头，抖动着秦腔神经的那就更是如繁星眨动，数不胜数。在以搞钱为生命本质要义的人类活动的今天，尚有如许多人爱着这么土头土脑的“赔钱货”，且摇头晃脑，闭目击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真的已经让外人觉得很是不可理喻了。

我以为秦腔让西北人百揉千搓而不弃的根本原因，是它的阳刚气质对人的血性补充的绝对需要，就如同生命对钙、铁、锌、钾、锰、镁等微量元素需求的不可或缺。若以乾坤而论，秦腔当属乾性，有阳刚之气，饱含冲决之力，而这种力量也正是民族所需之恒常精神。秦腔似大风出关，如长空裂帛，为了一种混沌气象，甚至死死坚守着粗糙之姿，且千年不变，以有别于过于阴柔的坤性细腻。精致的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粗糙的反倒气血债张，寿比南山。这便是生命演进的本质机密。相对于今日一切都追求精细、极致之奢华，秦腔同样也面临着死亡的绞索，因为我们也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油光水滑邀宠献媚。我们很难抵御一些甜腻“坤”声的诱惑，不羁之“乾”腔因缺乏酥麻酥的蹭痒感而被时尚所唾弃，但一切时尚都是过眼烟云，唯有笨拙的古朴守望才是真正的生命常道。无论怎么活着，我们都需要阳刚，需要大气，甚至需要带着“毛边”的勃发与冲决，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吼几声秦腔。

有鉴于此，我写了长篇小说《主角》。我在文艺团体躬耕三十多年，秦腔这种生命的呐喊声不绝于耳。因此我写了一个由大自然形塑的山村放羊孩子成长为大都舞台秦腔女主角的故事。这个个体生命的苦苦追寻，也是群体精神诉求的集中映象，更是天地造化的水到渠成。感谢姜沼彬晁先生在翻译出版了拙作《装台》后，又用三年时间将《主角》翻译推荐给日本读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不仅因为小说长度是《装台》字数的一倍，还因文内有许多戏曲常识需要查阅验证。好在姜沼先生既是文学翻译大家，也是中国戏剧作品与理论专著的研究翻译大家，2021年他获得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我深深敬重着先生的执着与严谨。至今与先生还未见过一面，这是人生的巨大缺憾，只能遥祝他身体健康、文运光昌。（摘自《收获公众号》）